

罗翔刷屏：年轻时的怯懦并非不可弥补

□ 郭慧岩

这两天，法律红人罗翔的一段视频刷屏了。在一档谈话节目中，罗翔说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太。2003年冬天，当时还在北大读博的罗翔，路上遇到了一位白发苍苍、衣衫褴褛的老太太。这位老人从北京西站一路步行只为找一家法律援助中心。罗翔提出打车送她过去，老太太噢通跳下了。那时罗翔刚刚拿到律师执照，担心惹上麻烦，最终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当到了援助中心门口，老人一句“你就不用陪我上去了”，别影响你的前途，击中了罗翔，以至于虽然18年过去了，他还是难以原谅自己，他说：“我是在用虚伪的道德优越感来掩饰内心。”

罗翔用“怂”来形容当初的自己，这份坦诚打动了无数网友。该不该将年轻时候的“怂”完全归咎于自己，也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更多人对罗翔心里的那份内疚表示理解，不少人从罗翔的坦诚中也看到了自己当初的模样：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无奈地选择了妥协，正如网友说的“谁年轻时没怂过”。相信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过“不勇敢”的时候，而在在我看来，对于年轻时的怯懦、不勇敢可以有遗憾，但也不必介怀，更不应成为负担。

什么是勇敢？有的人可能会说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也有的人也许会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人们总会高估自己的勇气，等到真正面对时，却发现自己不如想象中勇敢。可能因顾虑太多而丧失了选择的机会，甚至会因懦弱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于是一些人就会陷入无休止的懊悔当中：如果当初我勇敢一些，可能就……慢慢地，这种懊悔可能就会变成心上的刺，总会在不经意间刺痛你的心。

有人痛不欲生，有人却痛定思痛，就像罗翔，他因当初的“不勇敢”而意识到真正的知识要从书本走向现实，我们才能看到如今这样淡泊、谦卑的他。从某种程度上看，对罗翔来说，年轻时的那份怯懦已成了他坚持的动力，让他成为更勇敢的自己，正如他今天可以开诚布公地讲述自己曾经的“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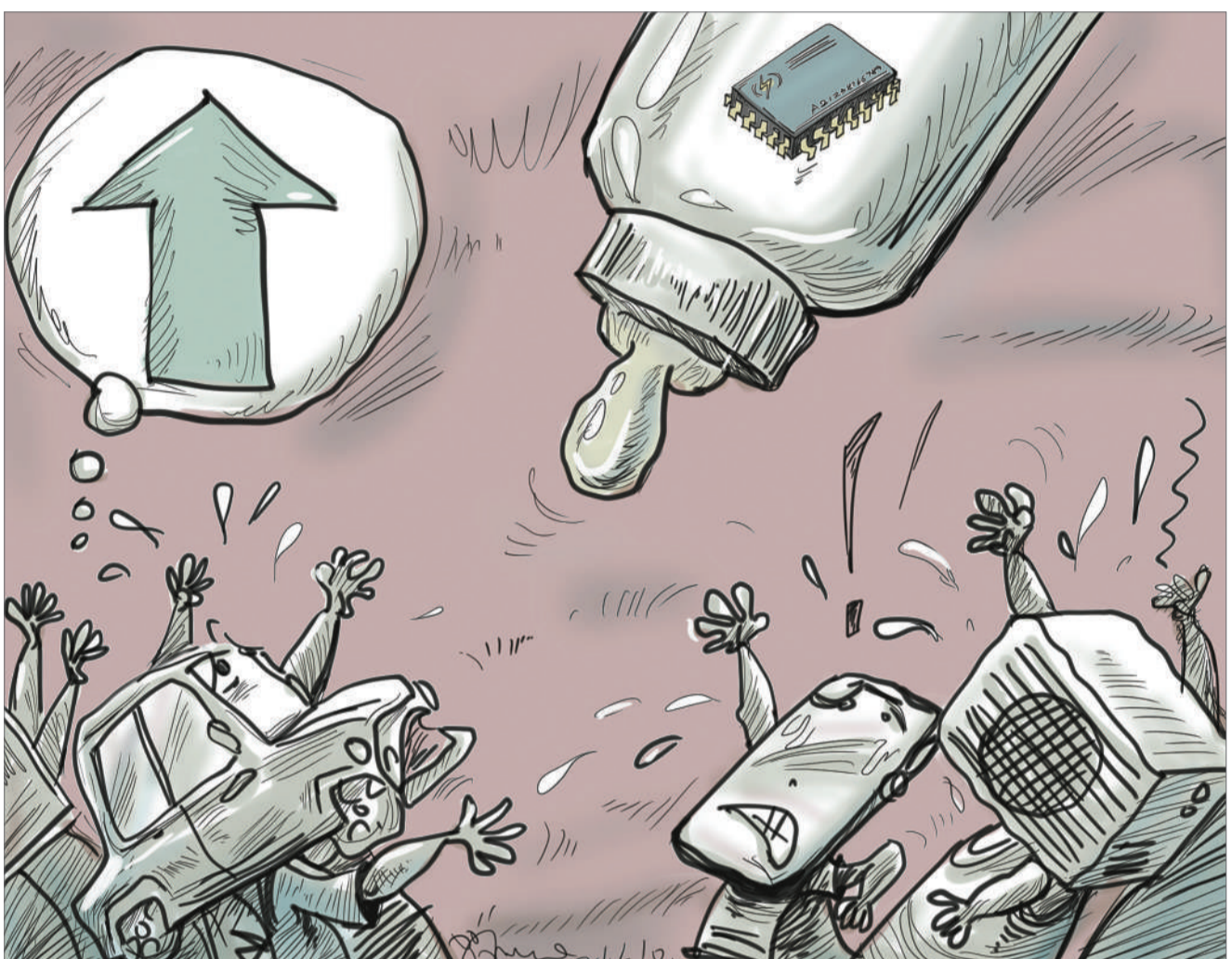
勇敢也好，怂也罢，人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历练中成熟起来、勇敢起来的，且不是那种匹夫之勇。此时，再回头看看来时路，也许会发现年轻时的“怂”并非不可弥补。

曾经，罗翔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说：在人类所有的美德中，勇敢是最稀缺的，当命运之神，把你推向勇敢的时刻，希望你能够像你想象中那么勇敢。

让你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变得勇敢，除了人自身成熟外，也需要社会为年轻人提供能够勇敢的条件，让他们更少些后顾之忧，不用担心惹上麻烦。比如可以不用拍照就能放心地扶起倒在地上的老人，能够教人于危难而不再费劲证明自己是一见义勇为，关键时刻，人们是选择勇敢还是退缩，与整个社会是否保护良善、维护公平正义有很大关系。

日前，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程民生在2021年毕业典礼演讲中提到，社会比较复杂，建议简单应对，以不变应万变就是简单，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简单，不忘初心就是简单，成功时不需要精明，更依赖坚持，稳稳坚守就是成功。

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怀有一颗勇敢的心，但可能因各种现实原因，在某一时刻选择了退缩，这并非不可弥补。只要我们不忘记年轻时的样子，保持良善、遵从初心，明白自己手中的力量，终有一天我们会拔掉心上的那根刺，成为自己想象中那个勇敢的大人。



缺芯

高盛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多达169个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芯片短缺的打击，包括钢铁产品、混凝土生产、空调制造、啤酒酿造、肥皂生产等众多行业。全球缺芯加剧，涨价势在必行。买不到和买不起已成为不少下游企业共同面临的困境。(央视财经6月7日漫画 徐简)

花几万元咨询填报志愿 能换来更好的人生吗

□ 陈禹潜

高考结束了，考生们将迎来对未来关系重大的志愿填报。据媒体报道，随着多地高考改革落地，志愿填报变得更加复杂，相关服务市场也因此更趋火爆，市面上出现众多以专业生涯规划、人工智能大数据服务、一对一辅导为噱头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价格数千到数万元不等，最高者甚至可达10万元。

高考志愿填报是生涯规划服务的一种，其应运而热，是因为市场需求巨大。大学对相当一部分家长来说是人生盲区，他们担心因为报考志愿的失误而毁了孩子一生。家长被相关机构三分靠考，七分靠报的焦虑营销所击中实在不足为奇。

在心忧孩子前程的家长们热捧之下，这一市场迅速扩张。若这些志愿填报机构

能为站在人生门槛上的年轻人指点迷津，提一些金玉良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事实上该行业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所谓专家更是泥沙俱下，培训师履历造假、数据分析名不副实、与民办大学合作坑害考生等神操作层出不穷。家长的资金投入打了水漂不说，还有可能影响孩子的前途。

因此，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乃至整个生涯规划行业的规范整顿刻不容缓。高考志愿填报是学生生涯规划的重要环节，只有能力、水平过硬的规划师才能提供有益指导。正规的学科教师都需要资格证书，志愿填报规划师在国家层面却并没有统一标准，这一职业对学生人生产生的影响可能丝毫不弱于教师。相关部门应该尽快确立监管体系，对那些夸大宣传、乱收费的机构应加强监管和查处，保障广大考生的利益。

从根本上说，高考志愿填报和生涯规划

机构都只是给考生打辅助的，真正的决定还需要自己做。事实上，正规的生涯规划机构也只是在考生确立自己人生理想抱负的前提下，帮助做出更优的决策。相较于权衡城市、学校、专业好坏对人生发展的利弊，对自己人生的思考是需要更早开始的一件事情。

如何填报志愿，也是一场另类的考试。在志愿填报上，考生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究竟对什么专业感兴趣，再搜索、甄别互联网上的信息，最后再反复思考做出决定，即使不能完全自己做主，也应该积极参与进去，为自己的人生谋划。

没有参与感的人生不值得过，学生和家長在仔细甄别生涯规划机构之前，不妨先擦亮眼睛看看未来的路，毕竟即使是一单10万元的高考志愿填报，也没法帮你规划人生志愿。让孩子学习如何面对选择进行复杂决策，同样是人生的宝贵经历。

推进非升即走 还需与青椒将心比心

□ 熊丙奇

近日，在某些社会事件的影响下，国内高校青椒群体（即青年教师）的现实处境再次受到广泛关注。其中，许多高校现行的非升即走制度，一时成为舆论焦点，引发了诸多争议。这一制度为何令不同群体爱恨交加？又应如何进一步改善？无疑是十分值得讨论的议题。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就有高校实施非升即走制度。所谓非升即走，指的是被聘教师若在聘期内没有完成规定的任务，实现晋升目标，便必须离开岗位，另谋高就。由于这一制度源于部分发达国家的终身教职轨道制（Tenure-Track），因此也被看做一种舶来品。进入21世纪，我国实施类似制度的高校越来越多，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大多实行非升即走制度。而伴随非升即走的推进，很多人开始质疑这一制度水土不服，不少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将年轻人当韭菜割的制度，导致青椒群体压力大、心理问题多，被淘汰的教师与高校的矛盾也存在激化的趋势。

为何非升即走制度会遭遇水土不服？我国高校该如何推进非升即走制度？是各大高校必须直面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某种程度上，这与当前高校破除唯帽子论、唯职称论是同一个问题。

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对非升即走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价，是很不一样的。近年来，我国高校发表国际论文数、申请专利数快速增加，我国大学的世界排名提升很快，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而且，这一制度减轻了学校的人事负担，那些没有通过聘期考核的教师，在合同期结束就被解聘，不像以前因为有编制，很难淘汰达不到学校考核要求的教师。发达国家大学实施非升即走制度，也有考察新聘教师是不是学校所需人才的考量，前几年轻格考核，达到考核要求后即聘为终身教授，这些教师将不再有被解聘的顾虑，从此可以安心教学研究。

但是，这一制度并非完美无缺，总体看来，青椒们对非升即走制度的意见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考核、评价由行政部门制定指标并执行，大多采用量化指标，让教育与学术变得功利化。比如，很多高校的考核、评价都存在重学术研究，轻教育教学的问题，投入教学得到学生好评而发表论文少的教师，由于达不到晋升的要求，往往不得面临走人的结局，这导致教师不重视教学，而一心想着怎么发表论文。而在最早施行类似制度的发达国家，是由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负责对青年教师作出具体评价的，评价者会同时考量青年教师的学术成就、学术潜力与教学能力。

其二，青年教师缺少平等获得学术资源的机会，存在按级别分配按帽子分配现象。在不少实施非升即走的发达国家，博士毕业的新聘教师，也可招收博士生，独立开展课题研究，而在国内，博导在不少高校仍被视为比教授更高的头衔，这也是一项单纯的职务。青年教师常只能跟着某个课题组开展研究，帮博导带学生，这也就影响他们获得成果、完成聘期考核。

幸运的青年教师能获得某项课题，然后成为某某课题（项目）获得者，顺利通过各项考评，而没有课题、项目、头衔的青年

教师，则逐渐被边缘化，直到被淘汰。

其三，固然有人指出：青年教师自己要有清醒的自我认知，没有达到考核要求时要坦然接受结果。然而，具体到每个青年教师身上，会有户籍、家庭、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一些沉重的现实负担，如果他们缺少基本的生活保障，被淘汰的青年教师难免心态失衡。

高校想要更好地推进非升即走，需要站在青年教师的角度上，将心比心地展开制度建设。一方面，学校要合理确定淘汰比例，同时关注被淘汰者的再就业问题。此前，某些高校极低的晋升率，就曾引起青年教师的严重不满。极少数升，大多数走，无疑背离了非升即走的初衷，也会导致学校在招聘新教师时降低门槛。

另一方面，各大高校还应积极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作用，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帽子。只有让专业评价取得主导地位，减少行政和利益因素对评价的干扰，才能提高评价的透明度与公信力，使得青年教师即便走人，也能接受评价的结果。

教育评价要回归育人本位

□ 李朝晖

教育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任务，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评价是办学的指挥棒，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我们施行的是知识教育，教书与育人相互分离，教育评价存在着功利化的错误倾向，教育的育人功能大大消解，学生没有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我国教育领域全面改革，将促进教育评价回归到育人本位上来，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坚实保障。

马克思一生非常重视对人的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是其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高度指出：衡量人类进步的根本标准，归根到底在于人类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个体而言，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和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主要功能在育人，教育评价也必然着眼于育人本身。

在教育过程中，教师不仅是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世界观和道德品质，也就是形成社会人的具体社会特征，这需要通过育人来完成。育人是用社会主流认可的价值观念来教育学生，进而保证我们的办学方向。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人，掌握的知识越多，对社会、对他人的危害会越大。因此，我们要把教育评价回归到育人本位，以培养能够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个人经历不同，建立的教育理论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都强调育人的重要性。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认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没有道德的人，学问本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近代德国教育家赫巴特明确指出：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最高的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

受教育评价指挥棒的影响，智育第一的观念在国人心中仍根深蒂固，仍深深地根植于许多教师、家长的头脑中。我们也倡导了多年，要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的弊病，但收效甚微。青年学生的思想尚未成熟，他们要面对各种复杂的能力、形形色色的思想的冲击，要在各种价值观交错出现的社会生活面前决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这迫切需要老师给予指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面对分数决定前途命运的利害，学生学习的目的为考试，考试的目的为升学，升学的目的为将来找到好工作的充分发展。教育的一切都靠边站，教育的育人功能被挤得无立足之地。现实提醒我们应切实把育人放到应有的位置上，促使教育返璞归真。

人的素质中有比知识、能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学生优秀的品质、健康的人格、良好的行为习惯、卓越的创新能力、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和谐与人处世的能力，等等。教育评价是办学的指挥棒，决定着办学方向，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观就会有怎样的教育观，我们一定要让教育评价回归育人本位，真正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作者系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教授）

讲好数字青年的故事 破圈国际传播

自由谈

□ 姬德强

国际传播工作既是一国之所愿，也是各国之所系，其中既有自我的言说，也有他者的认可，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对话性的观念空间和实践场域。对于一个有着复杂维度的中国形象来说，中国故事的立足点如何找寻，中国故事的突破点如何发掘，成为对外传播工作长期以来的重心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对新时代如何系统把握国际传播规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总体要求。其中，对于多主体、立体式、分众化等传播策略做了明确阐述。

在一个数字革命赋权多元个体，数字平台链接多少青年群体形成新生态中，作为数字原住民或早期数字移民的青年群体，有着更为丰富的技术素养，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以及更具间性的文化精神。如何依托青年群体，尤其是在后疫情语境下，做好数字空间内的国际传播，搭建基于青年群体的网络命运共同体，理应为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突破点。

数字青年故事是中国故事的生机所在，更容易产生破圈的效果。中国青年群体的成长与社会的数字化和平台化进程同向互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青年是数字空间内最活跃的社会群体，是最具传播生产力和连接能力的产销者，尤其表现在游戏、娱乐和社交媒体领域，而这三者极易产生国际传播的破圈效果，甚至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字青年一起共同创造超越国别差异和文化模式的第三中文化。第二，青年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生力军。在互联网企业员工到外卖小哥，再到正在经历数字化、智能化和平台化的各行各业中的青春身影，共同构成了一个数字时代的青年中国劳动者群体。这些连接的劳动者是新时代中国创新发展的动能所在，也是世界认

知中国崛起的代际框架。数字青年的这些活力特征将有力破除国际传播场域中的意识形态藩篱和文化偏见，也驱动着中国故事的年轻化和数字化的转型。

数字平台是青年群体走向世界的主要舞台，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深度了解与青年文化同构的各类数字工具的技术逻辑和文化偏向。长期以来，参与文化被认为是数字空间内的主要文化形态，创造着文化的多样性，孵化着民主的技术想象，然而，仅仅从参与的角度来进入数字平台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对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的助力也是不足的。深度拆解全球各类数字平台的技术架构，我们也许可以得出如下阶段性结论：数字化本身就是一个个体化和群集化的辩证过程。个体化指的是个人的消费、展演及其网络化传播，对国际传播而言，是如何精准对位的问题；而群集化是网络行动主义的问题，即是政治性的，也可以是反政治性的，即超越时空边界而形成的虚拟社群及其集体行动，对国际传播而言，是如何咬合乃至孵化的问题，深入研究社群力量跨文化为我所用。因此，要深入理解跨国家和跨文化数字青年群体的虚拟社群传播机制，才能跟得上国际传播的数字化转型趋势，也将有力参与塑造一个可爱的中国形象。

数字青年是青年群体的媒介化和网络化存在新形态，也是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抓手。这一群体对国际传播工作的启示意义有二：第一，需要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参与者的代际差异，充分借助青年群体优秀的数字技术素养和文化破圈能力；第二，需要深刻把握数字平台的传播机制，避免单一的工具化解读，尤其是形成新的青年文化潮流的技术与市场动能。

在数字平台的驱动和加持下，国际传播正在往全球全域的互联互通、虚拟现实交叉互融而迈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亟须数字青年的力量。国际传播的话语和实践也将面临青春化转型。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